



国门初开下中西文化的 碰撞与交融

大清王朝经过“康乾盛世”的繁荣，自乾隆后期开始走下坡路。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的道光中期，已是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军队孱弱、国力衰微。而此时远在欧洲的英国，经过工业革命之后国力得到很大提升，出于本国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正在积极寻找海外市场，衰弱的中国自然成为其觊觎强食的目标。1840 年英国对华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腐朽的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中仓促应战，结果屡战屡败，被迫于

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南京江面的英舰“康华丽”号上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同意割让香港，赔偿英国军费2100万元，并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五个东南沿海城市辟为对外通商口岸。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 风雷激荡的时代背景

战后随着外国廉价工业品的大量输入，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加上灾荒频仍，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各种形式的反清抗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终于酿成1851年以洪秀全为领袖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

洪秀全原名仁坤，1814年1月1日出生在广东花县一个自耕农家庭。从小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科场失意后开始接触西方基督教，并比附中国封建经学创立了拜上帝教。1844年4月，他与表弟冯云山离开家乡外出传教，初期并不顺利。后来冯云山进入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在广大农民中宣传拜上帝教。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数以千计的农民抛掉世代沿袭的多神信仰，转而崇拜一个“皇上帝”，为反清起义奠定了坚实基础。洪秀全也由此萌发了推翻清王朝，建立人间天国的念头。

1850年9月初，洪秀全命散居各地的拜上帝教信徒于11月4日汇集桂平金田团营，次年1月11日宣布起义。同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县东乡正式登极称天王，封立幼

主，建立太平天国，以本年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9月25日太平军攻克广西永安（今蒙山）封王建制，肃清奸细，为把起义推向全国做了必要的准备。

1852年4月5日，太平军撤离永安，北攻桂林，击毙清广州副都统乌兰泰。5月19日撤围北上，向湖南进军。南王冯云山在全州蓑衣渡不幸牺牲。6月7日太平军转入湖南境内，得到当地会党的热烈拥护和支持。6月12日起连下道州、江华、永明、桂阳州、郴州，清军望风披靡。8月21日西王萧朝贵率奇兵奔袭长沙，9月12日在指挥攻城战斗中中炮阵亡。11月30日太平军久攻长沙不下，转而西进。12月13日占领岳州。1853年1月12日攻占武昌。2月9日洪秀全率数十万将士及家属，分水陆两路撤离武昌，沿江东下。一路帆樯如云，旌旗蔽野，势如破竹，连克黄州、九江、安庆、池州、芜湖。3月6日陆军抵南京江宁镇，9日进占雨花台，12日水军蔽江而来，分泊上河、下关，合围南京。3月19日太平军从静海寺挖地道破城，攻占南京，改称天京，据为首都，正式建立了与北京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政权。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进一步加强政权建设，修建了天朝宫殿（天王府）、九重天（东王府）和干王府等，作为中央政府的军政管理机关。先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两个纲领，要求平分土地和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军事上则作出三大决策：一是派劲旅北伐，直捣幽燕；二是遣重兵沿江西征，廓清上游，拱卫天京；三是坚守天京、镇江、扬州、瓜洲，抗击清军的围攻。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北伐军转战六省，连克数十城，但终因孤军深入，没有发动群众等原因而失败。西征军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站稳了脚跟，并据有武昌、九江、安庆三大重镇，

保证了天京的粮食供应和上游的安全。天京、镇江和瓜洲等地的太平军也粉碎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两年多的进攻，取得了城市防御战的重大胜利。

1856年初，东王杨秀清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清军江南、江北大营，以解天京、镇江之围。3月19日秦日纲率军进入镇江。4月2日夜渡江至瓜洲。次日猛攻江北大营，清军一溃再溃，两日内120余座营垒土崩瓦解。5月27日秦日纲自瓜洲南渡回京。6月1日在高资击毙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6月14日抵达天京城北燕子矶一带驻扎。

几乎在秦日纲率军激战镇江的同时，远在西征战场的石达开接到命令，速率三万大军赶回天京参加会战。6月20日太平军分三路发起总攻：一攻马群，一攻孝陵卫，一自灵谷寺下山，将满洲马队营盘焚毁。与此同时，天京城内太平军也从南门、通济、洪武、朝阳各门分路出击，攻破近城清军营盘，江南大营全线崩溃。向荣连夜败走淳化，经句容逃往丹阳。太平天国取得了一破清军江南大营的辉煌胜利，军事上达到了金田起义以来的鼎盛时期。

然而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内讧。众所周知，洪秀全虽贵为天王，但只临朝而不理政，总理朝纲的是集太平天国神权、军权和政权于一身的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建都天京后，洪、杨之间的政见分歧逐渐扩大。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动辄滥用天父权力下凡传旨，甚至借故杖责天王。洪秀全自然难以长时间地容忍他的一再轻狂冒犯。加上东王“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对北王、翼王等同僚肆意威逼欺辱，引起大家的普遍不满。一破清军江南大营后，杨秀清居功自傲，进一步激化矛盾，加速了危机的爆发。8月15日他说秦日纲、陈承塔帮妖，“朝内

诸臣不得力”，要天王下诏处罚，进而要挟洪秀全封其为万岁。天王决定先下手为强，下密诏给远在江西、湖北督师的韦昌辉、石达开及在丹阳的秦日纲，让其火速回京“清君侧”。

北王韦昌辉在江西前线接到诛杨密诏，急率兵三千日夜兼程，9月1日夜至天京与秦日纲会合，将九重天府团团围住。次日凌晨发起突袭，把熟睡中的杨秀清及其府内人等统统杀死，同时全面清洗东王部属。半个月后，天京城中两万余名东王部属被集体屠杀。翼王石达开得到京城内讧的消息，于9月26日赶回天京，力图制止滥杀。对诛杨扩大化表示不满。韦昌辉不但不听规劝，反而顿起谋害歹意。石达开连夜逃往安徽，北王便将翼王府中眷属人等悉数诛杀。

韦昌辉的血腥屠杀和擅专朝政，不仅造成天京大批太平军精锐无辜被杀，也引起洪秀全的不满和猜忌。洪、韦矛盾逐步升级。韦昌辉深感不安，于10月底派兵攻打天朝宫殿。天王下诏诛韦。11月初将战败被俘的韦昌辉及主要胁从二百余人处死，并将韦氏首级函送石达开。11月下旬，翼王自安徽回京辅政，人心始定。

然而杨、韦被诛后，洪秀全的皇权思想已高度膨胀。他错误地总结了杨秀清主政和韦昌辉擅权的教训，对外姓人心存疑忌，担心石达开重蹈杨、韦前辙，危及洪氏江山。于是封其长兄、次兄为安王、福王，与翼王同主朝政，借以挟制石达开，于是君臣相忌日深。1857年6月，石达开为避祸离京赴安庆。洪秀全极为震惊。他一面削去其兄安王、福王的爵位，一面镌刻“义王”金牌及朝内大小官员联名求救稟送往安庆，“百计迎回”。翼王重新回京主政。石达开不为所动，自9月起率大军10万余人陆续离开安徽，转战江西、浙闽、两湖、两广、云贵、四川等11省，历时6年之久，1863年6月在四川

省大渡河畔紫打地战败，全军覆没。

石达开的被迫率军出走 是“天京事变”的继续。由于事变中杨秀清及其精锐部属两万余人被杀，石达开离京出走又带走了 10 多万善战将士，致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人心涣散，疆土丧失，太平天国由全盛走向衰败，几乎到了覆亡的边缘。

面对这样的危局，洪秀全破格提拔一批年青将领到领导岗位上来，重建前期的五军主将制度；诏陈玉成、李秀成合“提兵符之令”，统一指挥太平军作战。天国政局“稍可自立”。

为了迅速打破战略上的被动局面，1858 年 7 月下旬 陈玉成、李秀成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攻庐州 再经滁州往攻江浦、浦口、来安、六合 消灭清军江北大营，以解天京之围。

8 月 23 日 陈玉成攻克庐州 连下店埠、梁园 抵滁州与李秀成会师。9 月 18 日至 27 日 太平军歼敌 17 000 余人，二破清军江北大营 取得了“天京事变”以来最大的一次战略胜利。陈、李乘胜占领扬州、六合 然后挥师西上 于 11 月 14 日至 18 日将孤军冒进至安徽三河镇的湘军李续宾部精锐五六千人合力全歼。太平军二破江北大营和三河大捷的伟大胜利 沉重打击了清军的嚣张气焰 重振了军威 为以后二破清军江南大营提供了有利条件。

太平军一破江南大营后，清军很快集结力量，并利用太平天国内讧之机再次包围了天京城。1858 年 1 月 清军江南大营强征数万民夫 在天京城外挖掘长壕“自城北之上元门至西路之三汊河、乐心寺江干止 共长一百三四十里 大小营垒一百三十余座 兵勇约四万有奇”。次年底 深阔各十余尺

的长壕完工。天京城对外交通几乎断绝，粮食、物资接济仅恃浦口一线，形势十分危急。太平天国决定仿效“围魏救赵”之策，奇袭杭州，攻敌必救，分敌兵力，然后返师回救，力解京围。

1860年2月，李秀成自皖南入浙江。3月4日克长兴，然后亲率六七千人乔装清军，沿莫干山麓小道奔袭杭州。19日破城，杀浙江巡抚罗遵殿。在咸丰帝的严旨催促下，江南大营抽调13000兵勇驰援杭州。李秀成侦知敌军中计，在城内遍插旗帜以为疑兵，于24日潜行撤出杭州，经余杭、临安循天目山北趋孝丰。4月11日李秀成在安徽建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围攻江南大营的计划。

4月底，10万太平军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江南大营，5月2日分五路发起总攻：李秀成由尧化门攻紫金山东麓，李世贤攻燕子矶，杨辅清攻雨花台，刘官芳攻高桥门，陈玉成攻江东、安德诸门。天京守军也自上方、安德诸门出击。4日，陈玉成部冒雨在上河、毛公渡等处搭建浮桥，攻打大营外墙。5日大营西部防线首先突破，得胜门至江边50余座清军营垒全被攻克。清军遂将上方桥拆断，以保江南大营。是日夜，李秀成、李世贤攻破城东孝陵卫清营，南部防线也告崩溃。6日晨，各路太平军合攻小水关和春大营，“附近南北各营皆火发”，“势已危极”，和春与张国梁狼狈逃往镇江。围困天京28个月的江南大营被彻底摧毁，天京解围。

5月11日，太平军诸将登朝庆贺胜利，并商议下一步进军战略。陈玉成主张先救安庆，李世贤主张往取闽、浙，洪仁玕则主张乘势进取苏、杭、上海，然后回师往攻湖北。李秀成赞同干王意见。洪秀全批准了洪、李东征苏浙的战略计划。

5月15日，李秀成率兵数万从天京出发，20日克丹阳，

毙提督王浚、总兵熊天喜。张国梁败走南门外尹公桥，因桥面被溃兵壅塞，策马过河时落水而亡。26日占常州。同日，逃往浒墅关的和春“以烧酒吞服洋烟”自杀身亡。30日下无锡。6月2日占苏州，清江苏巡抚徐有壬自杀。14日占浙江嘉兴。15日取昆山。22日占嘉定。30日克青浦。7月1日取松江，兵锋直逼上海。次年5月起，太平军又相继攻占了浙江大部分府州县。太平天国先后设立了以苏州为省城的苏福省和以杭州为省城的浙江天省，建立了各级地方政权。进而在上海、宁波等地与外国列强及其雇佣的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与太平军进军江浙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天京上游却出现了危机。英王陈玉成竭尽全力，多方出击，与敌殊死奋战，终未能解安庆之围。1861年9月5日安庆被湘军攻破，10000余守城太平军将士全部牺牲。陈玉成被迫退守庐州，次年5月突围奔寿州，被叛徒出卖，6月4日在河南延津英勇就义。1862年3月24日曾国荃率湘军由安庆沿江东进，从4月18日起连陷巢县、含山、芜湖等地。5月26日湘军陆师进至天京南郊板桥镇，进逼秣陵关。30日进驻雨花台扎营，距天京城仅四五里。

当时天京城防力量十分单薄，洪秀全一日三道诏旨，调李秀成回师救援。正在松江前线指挥攻上海的李秀成接到命令后回到苏州，两次召开军事会议商议救援天京大计。9月中旬，李秀成亲率10余万大军，携带新式武器回救天京。自10月13日起与湘军在雨花台展开生死大战。太平军昼夜围攻，枪炮齐发，历时44天，都因湘军坚壁固守，顽强抵抗而未能得手。11月25日，李秀成因雨花台湘军大营久攻不下，加上天气渐冷，太平军没有准备足够的粮食、棉衣而下令

撤围。

雨花台会战失利后，洪秀全为挽回败局，决定实施“进北攻南”的战略计划，即遣军进入皖北清军内线作战，以吸引曾国荃湘军往援，从而达到天京解围的目的。而与太平军作战多年的清两江总督曾国藩识破了这个计划，他命令皖北各县坚壁清野，以拒太平军。

1862年12月8日至15日，太平军分两批冒着雨雪过江，越江浦陆续西上。次年3月21日李秀成率后续部队占浦口，31日抵安徽巢县。由于皖北各县湘军的顽抗及坚壁清野，太平军无法得到粮食，陷入“大军扎脚不住”而城池“攻又不下”的窘境，“进北攻南”计划完全落空。1863年6月20日，李秀成自江浦经九袱洲渡江返京。“斯时正逢大江水涨，路道被水冲崩，无处行走”，湘军水师乘机进行拦截，太平军战死、溺死者数以万计。

6月26日湘军占江浦、浦口，30日破九袱洲，长江北岸尽为敌所有。至11月底，天京城外东、南、西三面要隘全部被湘军攻陷，仅钟山天保城、龙脖子地保城仍在太平军之手。天京已势如累卵，危在旦夕。12月4日苏州失守。20日李秀成返回天京，面奏天王“让城别走”，另图发展，遭到洪秀全的拒绝。

1864年2月28日，湘军攻占天保城，合围天京。6月1日天王洪秀全病逝，年仅50岁。5天后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7月3日地保城失守。湘军一面在龙脖子山麓修筑炮台数十座，对城头日夜轰击，一面在近城十几丈处潜挖地道。7月19日中午，龙脖子地道火发，炸塌太平门外城垣20余丈，天京陷落。城破当晚，李秀成携幼天王及残部1000余人，假扮湘军从太平门缺口突围而出。他把坐骑让给幼天王，自骑

劣马掉队，7月22日在江宁方山被俘。李秀成在狱中写下数万言的自述，8月7日被曾国藩杀害。

幼天王出城后，在数百人的护卫下经淳化、湖熟、东坝至广德，与干王洪仁玕会合。之后，幼天王与洪仁玕等人转战湖州、江西等地。10月9日洪仁玕在江西石城杨家牌被捕。10月25日幼天王亦在石城荒谷被俘。幼天王和洪仁玕先后被押至南昌，并分别于11月18日和23日遇害。

1866年2月9日，偕王谭体元统率的南方太平军在广东嘉应州黄沙嶂被清军全部歼灭。而西北太平军余部自1864年底在枣阳与捻军合并后，势力大增。1865年5月18日，在山东菏泽高楼寨毙清亲王僧格林沁，歼其所率精锐马队7000余人。清廷先后任命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湘、淮军全力镇压。1866年10月捻军在河南中牟分军，遵王赖文光率部在山东、河南、湖北、江苏等省活动，称东捻军；梁王张宗禹率部在河南、陕西等省作战，称西捻军。1868年1月5日，东捻军在扬州东北瓦窑铺被清军击败，赖文光受伤被俘，1月10日遇害，东捻军失败。同年8月16日，张宗禹所率西捻军在山东茌平徒骇河全军覆灭。至此，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最后悲壮地失败了。

2 传统与西学互现的文化源流

太平天国文化是伴随着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崛起和覆亡而出现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尽管只有短短的十几年，其内涵却显得相当

的复杂和多样。它记述了 19 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激烈动荡与革故鼎新，是观察和了解那个特定时代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情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封闭的封建社会在外力打击下，撕开了一个缺口，外国廉价工业品和西方文化的输入，犹如洪水猛兽，给古老的中国社会以猛烈冲击。在国门初开之际，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元素与价值取向发生了冲突，并且在相互碰撞的过程中不断交融、整合。国人在困惑与无奈中面临着压力、机遇和抉择。太平天国作为农民阶级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次伟大实践，自金田起义至最后失败，历时 18 年，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太平天国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太平天国的 18 年里，它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军事斗争等等决定着文化的走向，架构起文化的主要内容。以往人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层面，对其文化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成果寥寥，甚至于质疑太平天国作为农民政权是否有自己的文化。所谓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指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太平天国不仅有自己的文化，而且其内容还十分丰富。

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太平天国文化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众民俗文化相结合，并与西方外来文化相融合而产生出来的一种独具时代特点的文化。它的源流至少可以包括三个层面，即外来性、传统性和民众性。下面就从这三

个层面做一些简约的介绍。

（1）外来性

在中国连绵数千年的古代社会里，儒教、道教和佛教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成为封建王朝统治者治国驭民的精神武器和士大夫修身养性的行为规范。其中前两者为中国的本土文化，后者虽起源于古印度，但自东汉（公元67年）传入我国后，很快融入中国本土文化，并在南北朝时期得到飞速发展，对我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及民俗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了十九世纪初，宣扬上帝耶稣的西方基督教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地区活跃起来，这也是基督教在华的第四次传播。基督教创立于公元一世纪，曾在唐、元、明末清初三度传入我国，都因种种原因遭到禁绝。这种局面直到1842年才被英国大炮所打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承认基督教合法，信教自由。上帝的‘福音’最终是随着英军的大炮进入中国，在五个通商口岸建立的教堂里悠悠传扬的。但是这种外来宗教毕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悖，与民间崇拜的习俗相冲，加上外夷侵犯所造成的心理创伤，故而遭到中国官绅阶层和受宗族势力控制的大多数民众的普遍敌视。这种情结大大阻遏了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和发展。洪秀全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

洪秀全本是中国乡村私塾教育出来的一介儒生，从小就把手读书——科举——入仕当作人生的最大追求。他七岁入村塾读书，十二三岁即能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后来又自读历史和各类奇异之书，都能心领神会，融会贯通。其聪慧过人之处多次受到塾师和族中之人的赞许，认为他日

后定能中试入仕，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然而洪秀全后来的科举之路并不平坦。

1828 年他第一次参加考试即名落孙山。两年后他应聘本村塾师，一面教馆，一面苦读孔孟经书。1836 年洪秀全再次应试仍不中。苦闷中他独自踟躅广州街头，从别人手中得到一部宣传基督教常识的小册子《劝世良言》，“稍涉其目录”便将它置之书柜。1837 年洪秀全已 24 岁，他鼓足勇气又一次参加考试。初考时名列榜上，复考时却榜上无名。洪秀全难以接受这个事实，绝望中病倒广州，由人雇轿送回花县。回到家中病情加重，死去两日后复生，常常精神恍惚，口出诳语“斩妖，斩妖”，或在室内走动跳跃。家人见状十分焦急，延医投药仍无济于事。如此折腾 40 余日，方才慢慢痊愈。后来他对族人讲，自己病中做了一个“异梦”，上高天见了一位“至尊的老人”，封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命其降世救人。同时还自命自己为“太平天子”，表示要“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由此发泄对清朝不合理社会现状的不满，进而萌生出早期的反清思想和改朝换代的志向。

1843 年又逢应试之年，也是鸦片战争结束后广州开埠之年。洪秀全仍不死心，抱着一丝希望踏上了赴广州之路。这是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应试。结果与前三次一样，还是以失败告终。返家后他把孔孟经书摒弃地上，以表明与科举考试彻底决裂的心迹。

科场最终失意的洪秀全，心境发生了逆转，决心选择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彷徨之余，他潜心细读了先前在广州得到的那部《劝世良言》。书中的内容和新颖的观点“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令他顿感“大觉大悟”。该书说“天上有位独一真神上帝，是‘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全世界众人之大

父”掌握万权 人们只有信奉它 不拜别的邪神偶像 才能避祸获福 否则“获罪于天”。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就是受妖魔引诱 偷吃了禁果 遂引发灾难。为救世人 上帝特遣其爱子耶稣下凡赎罪救人。世间人人生而平等。这些基督教教义引起了洪秀全思想的强烈共鸣。他一面以此为理论基础，并比附中国儒家学说，创立了拜上帝教，一面又利用中国古书中天子受命于天和觐天帝于紫微等神话，自称自己是上帝次子 耶稣之弟 附会六年前那场大病死去乃是上天受命 复生实乃奉上帝之命下凡诛妖救世，拯救众生。通过广泛的传教宣传和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让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丢弃东方的多神偶像崇拜，转而信奉西方的唯一真神上帝，把一盘散沙的劳苦大众团聚在拜上帝的旗帜下，向以清朝皇帝为首的大小“妖魔”发起进攻 以期建立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的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以宗教立国，除对西方舶来的上帝、基督顶礼膜拜外，还对来自西方的其它先进东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建都天京不久 英、法、美等国驻华使节先后访问天京 太平天国明确宣布，愿意与各国通商，但严禁害人之物的鸦片。太平天国管辖区域内的对外丝、茶贸易额大大超过了清朝统治时期。当外国军舰停靠天京、镇江期间，太平天国官兵纷纷登舰参观，对舰上的枪炮设施等啧啧称奇，不时询问性能，很是欣赏。同时积极与外国各色人等沟通接洽，设法购买西洋先进的枪炮武器 装备军队。1859年，太平天国杨辅清部已经有了成建制的洋枪队。1860年5月 太平天国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后，相继攻占苏南和浙江大部分富庶地区，经济实力大增 从通商口岸上海、宁波获得的大量的西洋物品 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天京。干王洪仁玕曾对外国人说：“天王对于

引进欧洲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气机等类东西极为赞成。”忠王李秀成部还购置了先进的开花大炮，组建洋枪洋炮队，聘请西洋人充当教官，培训太平军将士掌握和使用西洋武器。甚至引进西洋设备，在苏州、太仓等地兴办小型枪械修理所，以维修在战争中损坏的洋枪洋炮。对主动投奔太平军的外国人，也予以接纳，并尊重他们的意愿，来去自由。此外，太平天国上层官员十分喜爱西方各色商品，通过不同渠道购置西洋绉纱类纺织品以及钟表、大风琴等物。当一些高档奢侈品损坏后，又请托外国人帮忙修理。在与外国人交往中彼此间礼尚往来经常互赠礼品包括书籍、食物和洋酒等等。这种明智的开放心态，与清朝统治集团一味拒绝西方文明的迂腐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

正因为如此，1859年，太平天国审时度势，正式颁布了向西方学习图强变革的政治纲领《资政新篇》。该纲领破天荒地提出因时制宜，效法西方制度，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交通、金融业等以“与番人并雄”。

《资政新篇》是中国第一个从理论上明确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先进纲领。它的颁布距中国五口通商仅仅相隔17年，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它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推向一个更高阶段，即由单纯军事上学习，发展到经济上和政治上全面学习，进而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远见卓识，无疑是进步的和划时代的。它比之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还要早9年。其丰富的内容和变革的力度，比之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可以说，当中国刚刚进入近代社会转型之时，太平天国受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包容接纳的不仅仅是基督教的

上帝耶稣，也包括西洋枪炮机械和各类商品，直至试图效法西洋各邦，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增强国力，以与西方各国并雄。

（2）传统性

太平天国文化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很大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还是集中在宗教层面，如信奉上帝耶稣和遵行十款天条等，太平天国文化的主体内容依然是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不论是儒生还是农民，从小都接受儒学教育和生活在传统社会的环境里，中国本土文化对其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洪秀全等人之所以走上反满抗清的道路，是因为不满于清廷的黑暗统治及其导致的生活窘迫和艰辛，最终促使他们披上宗教的外衣，借用基督教的上帝耶稣发动了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

前已提及，洪秀全自幼诵习孔孟经书，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构成他全部知识的主体。早在创立拜上帝教之初，在他所撰写的宣传其教义的小册子里，他就竭力把基督教的上帝与中国古代文献里的皇上帝联为一体 屡屡援引《大学》《诗经》《尚书》《书经》《孟子》等儒家经典来论证中国 自盘古三代 君民皆敬拜皇上帝”。声称古时“几千年 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 致被阎罗妖所捉”转而跪拜邪神，不敬上帝。所以他要“挽世人回头复行转当初这条大路”希图把西方宗教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让基督教的上帝中国化、大众化、唯一化 成为中国老百姓顶礼膜拜的

独尊真神。为此，他在太平天国颁刻的各类文献里，不厌其烦地引用传统文化的经句典故来诠释拜上帝教教义，粘合中西文化差异的缝隙，营造一个并不存在的所谓中外斯民同敬皇上帝的虚幻假相。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为了巩固新生的农民政权，洪秀全一面强化拜上帝教教义的宣传力度来统一江南民众思想，一面积极从传统文化里吸收营养，寻求治国方略，维护王权统治。《天朝田亩制度》作为太平天国前期的政治纲领，是天京政权绘制的地上天国社会的理想蓝图。这个蓝图融汇了儒家的大同思想，处处体现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和“公则天下平”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太平天国参照《孟子》井田制及《周官》“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的九等土地均衡之法，将所有田地按其产量高低，分成上、中、下三级，每级又分上、中、下三等，再将九等田按每户人口多寡及年龄大小均等搭配后，平均进行分配。同时对农副业也照《孟子》所载做出相应规定，种桑养蚕，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以期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目的。

太平天国军制和兵农合一的乡兵制，同样源自《周官》“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之说，但比之更为严整和完善。其规定每军设一军帅，五师帅，二十五旅帅，一百二十五卒长，五百两司马，二千五百伍长，一万伍卒，通军数13 156人。正是由于有这样严密的组织，划一的指挥，故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屡败清军，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

太平天国官制实行文武合一，在朝治事和外出领兵，其官名与品位没有区别。除了前面军制提到的军中官和乡官